

書評：

謝明達《離散法緣：橫跨南海之佛教及其現代主義》*

應磊

(美) 安默斯特學院 (Amherst College)

漢傳佛教徒始終在流動中。在漢傳佛教僧侶離散史和海洋東南亞現代宗教發展史의 交匯點上，謝明達的《離散法緣：橫跨南海之佛教及其現代主義》(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 是一本開創性的著作。《離散法緣》講述三位傑出的佛教僧侶——竺摩 (1913-2002)、演培 (1917-1996) 與體正 (1923-2002)——的生平事蹟，從而考察二十世紀中國和東南亞的佛教社群之間互動的歷史。

此著作最重要的貢獻是作者提出的“南洋佛教”(South China Sea Buddhism) 這一新範疇，在方法論上同時對佛教研究和中國宗教研究具有啟發意義。這一範疇促使我們重新審視佛教研究領域內習以為常的地域分野和傳統類別。換言之，倘若一個讀者的關注點並不在於東南亞，而在於佛教研究領域內約定俗成的分類標籤的構

* 這篇書評的寫作受惠於兩位 Jessica 的洞見：我要感謝專攻華語語系文學研究的陳麗汶 (Jessica L. W. Tan) 和從事佛教研究的俎曉敏 (Jessica Zu)。多年來，她倆不斷鼓勵我思考“中國文學”和“漢傳佛教”的邊界和潛能。中文版書名由原作者提供，謹此致謝。

設邏輯和實際影響，如“漢傳佛教”（或“中國佛教”）、“東南亞佛教”、“大乘佛教”、“南傳佛教”等標籤，這樣一個讀者會發現此書不容錯過。

明達在康奈爾大學完成博士訓練，此書脫胎於他的獲獎博士論文。明達提出“南洋佛教”的範疇，受惠於 Anne Blackburn 提出的“印度洋佛教” (Indian Ocean Buddhism) 的直接啟發。值得注意的是，“南洋佛教”這一範疇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也為語言因素所界定。明達寫道：

我用“南洋佛教”一詞指代海洋東南亞各種形式的佛教，其興起有賴跨越南中國海的佛教社群之間的聯繫，其經典和儀軌使用漢語普通話、中國南方方言和東南亞的多種語言。(頁2)

“南洋佛教”這一範疇一方面與“東南亞佛教”、“南傳佛教”展開對話，一方面與“漢傳佛教”、“大乘佛教”展開對話。我們先看前者。通常語境下，“東南亞佛教”近乎被視作“南傳佛教”的同義詞，儘管南傳佛教僅在大陸東南亞居於主導地位；與此同時，海洋東南亞則被視作伊斯蘭或天主教的領地。明達指出，這種兩分的思維方式——即大陸東南亞屬於南傳佛教，海洋東南亞屬於伊斯蘭和天主教——無法準確反映東南亞的宗教多元性。他在另一場合進一步指出，在南傳佛教研究領域，在海洋東南亞傳播的南傳佛教至今仍少有學者問津¹。我們再來看另一方面。在東南亞安家的漢

¹ Meng-Tat Jack Chia, “The Road Less Travelled: From Landways to Seaways in the Study of Theravāda Buddhism,”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22.1 (2021): 212.

傳 / 中國佛教 (Chinese Buddhism), 通常則被視作 “漢傳 / 中國佛教 (Chinese Buddhism) 的延伸而非東南亞佛教” (頁 8)。在原著中, “Chinese Buddhism” 在這句話裏連續兩次出現, 其所指並不完全一致。“Chinese” 一詞既表示 “漢傳”, 同時又指向 “中國”。恰因如此, “漢傳 / 中國佛教” 纔構成 “漢傳 / 中國佛教” 的所謂 “延伸”。

“Chinese” 一詞的多義性和歧義性, 正是我們討論的起點。《離散法緣》的人物、題材和取徑, 讓我聯想到 “華語語系” (Sinophone) 相關研究。近十餘年來, “華語語系” 文學及相關研究引人注目。事實上, 在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領域, 學者試圖把握這一現象已逾數十年, 從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ese”, 到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² 和 “華語語系文學”³。這一串名號標記一道批判意識的軌跡, 在史實和理論的雙重層面上, 強調 “China”、“Chinese”、“Chineseness” 這一系列經由歷史累積塑造的範疇, 無論是在地理意義上還是政治意義上, 都不應被拘囿或化約於現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文 “Chinese” 一詞, 同時指涉國家、種族、語言及文化。華語語系文學研究受到法語語系文學、英語語系文學、亞美研究等領域的啟發, 折射出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內部的一種轉向, 即剝離將中國文學視作一種國家 (及本土) 文學的主流範式, 轉而擁抱另一種對 “中國文學” 的理解, 將之視作一個眾聲喧 “華”、關係錯綜的場域, 尤其側重後殖民與跨殖民語境下的文化生產、交流與消費。“華語語系文學” 由此應運而生, 甚至形成與

² Jing Tsu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

³ “華語語系文學” 一詞最初出現在史書美 2004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裏。史認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的作品應被視作 “華語語系” 文學而非 “中國” 文學; 見 Shumei Shih,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MLA* 119.1 (2004): 16-30.

“中國文學”分庭抗禮之勢。“華語語系”植根於語言上的公分母，從音聲到書寫，捕捉在中國大陸內外不同地域（間）展開的華語文學實踐的向心與離心，共鳴與爭鳴，交響與異響。

準確地說，《離散法緣》是一項聚焦華語語系佛教 (Sinophone Buddhism) 的研究。我們不難看見《離散法緣》和華語語系研究之間的共通之處：立足具體地方，強調在地性，在此基礎上把握一系列跨地域而且超越民族國家框架的歷史現象。無論是宗教實踐還是文學實踐，根與徑 (roots and routes)，身份與歸屬，這些都是恆久耐人尋味的課題。在《離散法緣》原書裏，“華語語系”一詞在致謝中曇花一現——恰因如此，留下繼續討論的線索和空間。

事實上，“漢傳佛教”這一深入人心的語詞本身便具有“華語語系”的意味。以漢文書寫的大藏經是漢傳佛教的基石。與此同時，漢傳佛教的傳播有賴歷史語境中真實的人，他們操各式各樣的方言和口音。對關注現代漢傳佛教的學者而言，寬泛定義的華語語系研究可供借鑒的素材和思路相當豐富。讓我在此簡要陳述我的觀察。長久以來，現代漢傳佛教的“現代性”究竟為何，現代漢傳佛教又（應）是怎樣一種“佛教”，這些問題獲得學者、觀察家和漢傳佛教徒自身深切的關注。然而，現代漢傳佛教的“漢傳”面向，尤其在二十世紀地緣政治、離散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漢傳”與“中國”的糾葛，則尚待細緻的考察。

《離散法緣》的三位主角，正是流動中的佛教徒的傑出代表。他們來自三個東南亞國家：竺摩被譽為馬來西亞漢傳佛教之父；演培是現代新加坡四大高僧之一；體正，佛乘 (Buddhayāna) 運動的發起者，被廣泛視作首位出生於印尼的比丘。我們先來看竺摩和演培。竺摩和演培的生命歷程在漢傳佛教僧侶離散史上具有典型性。閱讀

他們的故事，立即讓人想起美國歷史學家尉遲酣 (Holmes H. Welch, 1921-1981) 的三部曲：*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 1900-1950* (1967),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1968), *Buddhism under Mao* (1972)⁴。尉遲酣的三部曲是英語學界近現代漢傳佛教研究的開山之作。這三部寫於冷戰時期的著作，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縱貫三部曲，最為尉遲酣倚重的口述史材料來源，正是在家國動盪的二十世紀中葉離開中國大陸、遷徙海外的漢傳佛教僧侶。換言之，近現代漢傳佛教研究在英語世界最舉足輕重的發軔，是透過這群離散的菁英僧侶的視角開啟的。

誠如明達所言，一種中國中心主義滲透尉遲酣的三部曲。值得補充的是，竺摩和演培的故事更不可能被尉遲酣公允地“看見”，哪怕他曾有機會訪問他們。尉遲酣對銳意謀求革新的僧伽領袖太虛 (1890-1947) 深懷不滿，而自閩南佛學院畢業的竺摩和演培都與太虛關係密切。竺摩親承太虛教澤並獲提拔，演培則受教於太虛的重要弟子印順 (1906-2005)。竺摩和演培的南洋弘法在在彰顯太虛倡導的“人生佛教”的深刻影響。《離散法緣》不僅照亮這兩位心志廣遠的高僧令人景仰的生命軌跡，也為我們理解佛教現代主義 (Buddhist modernism) 尤其是太虛的遺產的輻射範圍和多元形態打開了新的視野。

《離散法緣》的三位人物中，顯然，體正的故事最有意思。與竺摩和演培生於中國長於中國不同，體正來自荷屬東印度的一個土生華人 (Peranakan Chinese) 家庭。在荷蘭求學期間，他通過和神智學

⁴ Holmes Welch,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 1900-19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Holmes Welch,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協會 (Theosophical Society) 的接觸而對佛教產生興趣。如果說竺摩和演培的弘法活動見證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和東南亞各地的佛教社群之間的聯繫，那麼體正的比丘形象和他發起的佛乘運動則凸顯“漢傳佛教”與其印尼身份認同之間的張力。在獨立後的印尼，對體正而言，倘若有一種佛教適合這個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國家，這種佛教必須“不那麼中國” (less Chinese)。全書對此再三致意 (頁 11, 118, 152)。必須說明，這裏“Chinese”顯然是多義的。如同體正其人，他所倡導的佛乘運動也是多語系和跨傳統的：南傳的僧袍，自巴利語譯成印尼語的祝禱辭，“真主元佛” (God Primordial Buddha) 及伴生的對“三身”教義的重新闡釋 (真主元佛被視作“法身”)，不一而足。佛乘運動高揚一種現代印尼版本的“一乘”宏大理想。在“一乘”的屋簷下，混搭的各路元素濟濟一堂，結果的確“既非大乘亦非南傳” (頁 117)。佛乘運動的重點首在“印尼”。體正充滿個人風格的宗教實驗為史書美提出的“反離散” (against diaspora) 提供了一個佛教版本的範例：移民落地生根，不再回望原鄉⁵。倘若尉遲酣曾有機會結識體正，我們不難想像，他大概不會選擇體正作為受訪人。然而，與此同時，體正也不會認為自己理應成為尉遲酣筆下的“漢傳佛教”的一分子。

《離散法緣》一書展現的海洋東南亞漢傳佛教徒群體鮮為人知。他們處在“中國和中國性的邊緣”⁶，連帶亦處在“漢傳 / 中國佛教”

⁵ Shu-mei Shih,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25-4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⁶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4.

的邊緣。然而，邊緣恰恰構成新的焦點，新的起點。“南洋佛教”的範疇將東南亞納入漢傳佛教研究，同時亦將漢傳佛教帶入東南亞研究。明達提出的“南洋佛教”讓人想起貝納子 (Brian Bernards) 的“書寫南洋”，兩者都試圖超越民族國家範式而嘗試一種“群島式反思”(archipelagic rethinking)。⁷ 這些步履不停的僧侶借力於亦維繫著亞洲內部的“接觸星雲”(contact nebulae)⁸ 和“華語語系迴徑”(Sinophone circuits)⁹。他們的在地經驗指向 Charles Hallisey 所說“意義的地方生產”(local production of meaning)¹⁰，並彰顯“多元性如何多元並無一定，異質性如何異質各有千秋”¹¹。從重洋遠渡到靈根自植，諸般令人感佩的“離散法緣”提醒我們，對佛教“中國化”的討論無法迴避一個問題：何為“中國”？

⁷ Brian Bernards, *Writing the South Seas: Imagining the Nanyang in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 14.

⁸ Karen Laura Thornber, *Empire of Texts in Motion: Chinese, Korean, and Taiwanese Transculturation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1-2.

⁹ Li Wen Jessica Tan, “Sinophone Circuits: Chinese-language Cultural Producti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old War,”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2021.

¹⁰ Charles Hallisey, “Roads Taken and Not Taken in the Study of Theravāda Buddhism,” in *Curators of the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edited by Donald S. Lopez, Jr., 4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¹¹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7.